

浙江城乡空间 转型研究

吴可人 著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城乡空间 转型研究

吴可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城乡空间转型研究 / 吴可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203-2558-5

I. ①浙… II. ①吴… III. ①城乡规划-研究-浙江 IV. ①TU984. 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9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言 浙江城乡空间转型的大势与机遇	(1)
一 城市：实现“中心地”到都市区的跨越	(1)
二 乡村：经历城乡同化到美丽乡村的演进	(4)
三 山区：造就贫困落后到绿水青山的崛起	(6)
四 人口：迎来数量与素质两大红利的渐变	(8)
五 产业：践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9)
六 空间—产业—人口的多重联动	(11)

城乡转型篇

第一章 提升中心城市和都市区功能的思路与对策	(19)
一 中心城市发展基础较好	(19)
二 高密度均质化空间支撑	(21)
三 提升中心城市和都市区功能的思路	(27)
四 探索中心城市和都市区功能提升的发展路径	(28)
第二章 创新浙江特色城市化推进路径	(31)
一 推进小城市大提升	(31)
二 开启特色小镇创新实践	(35)
三 促进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	(41)
四 厘清户籍制度改革方向、重点与路径	(45)
第三章 长三角乡村空间变迁特点、问题及对策	(50)
一 长三角地区乡村空间变迁特征	(50)
二 长三角地区乡村空间的碎片化问题及表现	(58)
三 构建新型乡村空间的对策建议	(62)

第四章 优化浙江省农居分布的分析及建议	(65)
一 农居分布是一项开创性研究	(65)
二 浙江省农居分布的主要类型	(66)
三 浙江省农居分布存在的主要问题	(75)
四 优化农居分布基本思路与对策	(80)
第五章 浙江省“十三五”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研究	(85)
一 统筹成效：进入更高水平的整体协调阶段	(85)
二 统筹思路：推进城乡一体化、特色化发展	(90)
三 统筹建设：一体化格局下的城乡特色推进	(92)
四 统筹制度：一体化格局下的城乡整合建构	(94)
五 统筹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城乡联动转型	(95)
城乡转型案例研究	(97)
第六章 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分析与对策	(97)
一 杭州城市国际化现状分析	(97)
二 杭州城市国际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03)
三 提高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对策举措	(104)
第七章 后 G20 时代提升杭州城市核心竞争力研究	(109)
一 杭州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三维度分析	(109)
二 杭州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成因分析	(113)
三 实施三大战略放大杭州后峰会效应	(116)
第八章 新常态下台州在全省发展战略中的定位研究	(121)
一 重新研判台州在省域空间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121)
二 确立台州在浙江省经济新增长极定位	(127)
三 加大对台州市多元支持	(130)

山区转型篇

第九章 浙江省区域发展的新均衡战略研究	(133)
一 从均衡走向新均衡	(133)
二 新均衡战略的现实基础分析	(135)

三 积极实施区域发展的新均衡战略	(144)
四 加快非“V二”区域发展的若干思路	(147)
第十章 创新山区发展模式研究	(150)
一 山区发展是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50)
二 山区转型发展新态势	(151)
三 践行“两山”理论下的发展模式创新	(154)
四 发挥“四大”优势推进绿色发展	(155)
五 山区“五创联动”发展战略构想	(157)
第十一章 推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探讨	(161)
一 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	(161)
二 正确处理客观制约与主观要求的矛盾	(162)
三 积极推进工业特色化发展	(167)
四 完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相关保障	(172)
第十二章 浙江省避暑度假产业发展研究	(174)
一 避暑度假产业快速崛起	(174)
二 让浙江人夏天有好去处	(177)
三 打造若干个“浙江省的庐山”	(181)
四 创新理念引领避暑度假建设发展	(184)
山区转型案例研究	(191)
第十三章 全面实施丽水市生态引领的山区现代化战略	(191)
一 初步形成生态引领的发展路径	(191)
二 深入分析实现现代化的多重制约	(198)
三 全面实施生态引领的现代化战略	(201)
四 扎实推进生态引领的四大举措	(202)
第十四章 新常态下缙云山区经济强县转型研究	(208)
一 超常态发展铸就山区经济强县辉煌	(208)
二 超常态发展面临传统优势式微挑战	(209)
三 超常态向新常态转换催生重大机遇	(211)
四 实施“创新创富·美丽缙云”战略	(212)

人口产业转型篇

第十五章 提升长三角人口集聚水平	(217)
一 长三角具有人口集聚与素质提升优势	(217)
二 长三角人口集聚的挑战	(219)
三 影响长三角人口集聚的主要原因	(225)
四 系统优化长三角人口集聚环境	(227)
第十六章 人口蓝领化格局转变分析及对策建议	(231)
一 人口蓝领化是浙江省过去一段时期的现实趋势	(231)
二 人口蓝领化成因分析	(234)
三 人口蓝领化危机分析	(236)
四 蓝领人口比重缓慢下降其势已成	(238)
五 着力推进人口转型	(241)
第十七章 服务业集聚区空间特征分析	(244)
一 集聚区的空间特征	(244)
二 集聚区的合理规模及功能	(248)
三 集聚区的选址建议	(252)
四 科学推进集聚区开发建设	(254)
第十八章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实践	(256)
一 开启新引擎：创新驱动促转型	(256)
二 积聚新动能：铸就万亿产业高地	(258)
三 做强新制造：打造全球制造业高地	(261)
四 促进新消费：实施节假日梯级旅游战略	(268)
人口产业转型案例研究	(271)
第十九章 浙江省游艇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以绍兴市为例	(271)
一 游艇产业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	(271)
二 浙江省发展游艇产业的潜在优势和迫切诉求	(273)
三 浙江省发展游艇产业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276)

四 着力打造游艇产业链	(278)
五 建设游艇基础设施	(282)
第二十章 以技术进步为主线的微观均衡重建	
——基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实证分析	(285)
一 浙江工业增速的下滑与回升均先于全国	(285)
二 技术进步成为浙江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288)
三 技术进步为主线的微观均衡重建	(294)
四 努力增强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的多重支撑	(298)
后 记	(300)

绪言 浙江城乡空间转型的大势与机遇

浙江城乡空间格局变化是浙江发展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民面对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经济薄弱的基本省情,以草根创业的冲劲闯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奠定了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活力较强、城乡一体化进程较快,以及要素布局空间均质化程度较高等“浙江特色”的基本面。

进入改革开放第四个10年以来,浙江城乡空间发展格局与过往30年有较大不同,城乡空间特色转型、区域经济协同转型、生态人居绿色转型、产业经济创新转型、发展改革成果全民共享等新趋势新要求更加凸显,开启了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 城市:实现“中心地”到都市区的跨越

新中国成立初,浙江城市化发端于“中心地”。即城市化以少数中心城市为核心。这一时期的城市特征是封闭,各中心地“关起门来算账”,然后和周围的其他中心地比拼,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这个过程形成了浙江以杭宁温为中心地的最雏形化的城镇空间体系。

关于这种城市空间分布形态,最经典的概括是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这一理论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士(A. Lö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原理》(The southern German center principle, 1933)一书中,首次提出中心地是向居住在它周围地域(尤指农村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结合南德实际,归纳形成支配中心地体系的三个原则,即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并建立与三大原则相对应的严密的、有规则的中心地等级结构及分布模型。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地区联系不断加深,要素流动共享更加频繁,

中心地理论与当前城市发展实际存在偏差。一是强调中心地等级，忽视了中心地和周边地区，以及不同等级中心地之间的共同利益。二是严格规定了城市等级体系中各级城市的数量，不符合不同地区、受多种因素影响下城镇等级数量具有较大不同的实际。三是按照就近原则确定市场区与中心地的从属关系，认为区域总是首先接受最邻近的中心地的辐射并获得服务。这一假设大大缩小了高等级中心地的腹地范围。伴随现代化交通、信息等的广泛运用，时空对要素流动、城市交流的制约大幅弱化，中心地之间，以及区域与不同等级中心地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和紧密，都市区、城市群加快形成。

浙江以“中心地”为主要形态的城市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转变。改革开放促使浙江生产要素“就地闹革命”，形成浙江全地域泛城市化的原点，浙江城市化快速弥漫于多数地区的角角落落。只不过当时周边地区集聚能力尚无法与长期形成的中心地抗衡，中心地的集聚态势仍一段时期保持领先。1990—2000年，杭宁温三个市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从7.8%提高至2000年的12.7%，提高近5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周边地区城市化快速追赶甚至超过中心地，加速了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崛起。这里有两组数据佐证：一是中心地周边新区、新城加快崛起，形成更大范围都市区空间。典型的如杭州市区及其周边，2000—2010年，5个老城区常住人口占比提高0.9个百分点，4个新城区人口占比提高0.7个百分点。同期，位于杭州都市区紧密圈层的绍兴柯桥区、嘉兴海宁市和湖州德清县3地，人口占比提高0.2个百分点。2010—2016年，5个老城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持平，而4个新城区比重继续提高0.4个百分点达7.2%，3个紧密区比重亦继续提高0.5个百分点，达4.8%，见图表0-1。二是城市化不再以少数中心地为核心，在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地带和浙赣沿线，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载体。在环杭州湾地区，每万平方公里城镇数达80.4个；在浙中地区，半径约5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七八个具有活力的城市。

与中心地城市化理念不同的是，都市区和城市群语境下的城市化，其核心词汇不再是封闭、竞争等，而是协同、合作，以及在全球尺度上考虑城市竞争力问题。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审时度势地提出，“加快建设环杭州湾城市群、温台城市群、浙中城市群，大力提升四大都市区综合能级和国际化水平，积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提法，与浙江城市化

的实际、开放发展的要求，以及全球化的趋势高度契合，为浙江新一轮城市化注入新动力。

下一阶段，立足杭、宁、温及金—义四大都市区，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海洋经济战略等开放发展重大机遇，积极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世界级城市、城市群和城市带，是浙江当前及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具体而言，要着重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杭州如何切实发挥后 G20 优势，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及世界名城影响力；杭嘉湖绍 4 地如何共建共享覆盖 3000 万人口的世界级城市群，强化与世界沟通的窗口和桥梁地位；浙江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对内统筹各都市区之间以及义甬舟大通道、沿海大通道的空间、产业、设施布局建设，对外建立健全与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之间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发展机制，科学认识和积极破解上述问题，浙江的城市完全有可能跃升为全球的引领者。

图表 0-1 杭州都市区常住人口分布

地区		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 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0 年	2016 年
浙江省		4144.6	4593.1	5442.7	5590.0
杭州 5 个 老城区 (万人)	上城区	21.1	33.5	34.5	35.3
	下城区	25.7	41.2	52.6	53.6
	江干区	36.1	56.5	99.9	106.2
	拱墅区	29.3	42.9	55.2	58.2
	西湖区	35.4	59.3	82.0	84.4
	合 计	147.6	233.4	324.2	337.7
杭州 4 个 新城区 (万人)	滨江区	/	11.6	31.9	33.6
	萧山区	113.1	123.3	151.1	157.2
	余杭区	86.1	81.8	117.0	135.9
	富阳区	58.1	62.9	71.8	73.6
	合 计	257.3	279.6	371.8	400.3
杭州都市 区紧密 层 3 地 (万人)	柯桥区	89.3	79.2	103.1	127.6
	海宁市	61.8	66.6	80.7	83.5
	德清县	39.9	43.7	49.2	55.5
	合 计	191.0	189.5	233.0	266.6

续表

地区		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 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0 年	2016 年
占全省 比重 (%)	5 个老城区	3.6	5.1	6.0	6.0
	4 个新城區	6.2	6.1	6.8	7.2
	3 个紧密区	4.6	4.1	4.3	4.8

二 乡村：经历城乡同化到美丽乡村的演进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在城镇村等多数集聚点齐头并进的推进，使得浙江的乡村地区具有了城市的典型特征。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环杭州湾、温台、浙赣沿线等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城镇空间占据绝大部分国土面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乡村物质风貌城市化、村民生活方式非农化。典型的如杭州至宁波沿线，建设用地覆盖的地区占据这一轴线总长度的近七成，杭州萧山区和绍兴杨汛桥镇、钱清镇，余姚泗门镇和慈溪周巷镇，城乡建设用地边界已经相连。同时，这一带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具有城市居民的特征。乡村传统氏族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重商思潮和外出打工漫卷乡村社会；乡村居民传统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结构也开始转变，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乡村地区被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乡村经济飞跃发展、乡村硬件设施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浙江面对薄弱的农业基础、落后的乡村生活条件，基于加快提升“三农”发展水平的自然选择，具有其较强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意义。但是，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来水乡生态风貌破坏、传统文化式微等不可逆的影响。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发展模式值得商榷。一是以城市建设模式改造村庄，乡村人居环境退化。村庄及农居拆并过于简单粗暴，缺乏对于人地关系、乡土情结的尊重；相当数量的新农村及农村新社区采用兵营式，缺乏与环境融合；户型照搬城市住宅，缺乏对农业生产功能的考虑。二是以工业取代农业，加剧工业粗放发展。浙江乡镇工业功能区 2002 年达到历史最高 985 个，占全省乡镇个数的 71.6%，特别是在环杭州湾的杭州、嘉

兴、绍兴和宁波，几乎每个乡镇都设有工业功能区。乡村独立工矿用地急剧增长，大有成为工业主平台之势。三是以乡村为代价发展城市，乡村生态人文价值式微。耕地大量被占用于建设，大面积连片的农田和生态空间呈“碎片化”，工业和生活污染加剧，水乡生态风貌难以完整再现。

现代城市规划学奠基人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在其巨著《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902）中这样描述理想的乡村，“乡村和城市应该像夫妇一般结合，这样一个令人欣喜的结合将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乡村发展不应追求与城市一样化，更不应彻底改造为城市，而应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走与城市差别化协调发展道路。

欧盟国家堪称乡村特色发展的典范。欧盟 91% 的疆土属于乡村地区，56% 的人口在乡村生活，乡村是欧洲大地景观的主体、度假休闲目的地，乡村发展直接决定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离开城市就能看到美丽乡村风光。例如，普罗旺斯遍地翻腾的薰衣草花海、托斯卡纳稻草垛守护的金色田野、铁力士山间白雪压顶的古老村落、圣托里尼岛上蓝白相间的民居，构成一幅幅乡土风景画，充满勃勃生机，美得令人心醉。

浙江的乡村是厚德载物的，应该看得见山水，记得起乡愁。近年来，浙江已认识到过去一段时期乡村城市化的弊端，重新确立城乡特色化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走出一条乡村转型发展的路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农民，在农村“三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探索创新，将村庄建设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农民。二是尊重自然，尽最大可能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复原田园水乡风貌。三是尊重历史，在深度发掘农耕传统、民族风情和民间技艺上做文章，培育建设特色文化村。杭州文村、嘉兴乌村、湖州余村等一批既传承地域传统村落形态及独特耕读文化，又具有现代化设施和服务的新村庄不断涌现；绍兴新南村、杭州乾潭、湖州莫干山等一批农业与工业、旅游、电商、文化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崛起。

三 山区：造就贫困落后到绿水青山的崛起

山区是浙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山地和丘陵面积占陆域面积70%左右。山区是全国的“碳汇池”，全省60.5%的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2位，省内林业资源几乎全部位于山区境内。山区是华东的天然“大氧吧”，空气环境质量普遍优于国家二级标准，负氧离子含量高达20万个/立方米。山区是浙江的“水源地”，全省八大水系全部从山区发源或流经山区，主要水系断面水质基本符合Ⅰ—Ⅱ类标准。山区是长江经济带上的“新庐山”，风光优美，夏季凉爽，广泛分布中山和高山台地，足以构成避暑度假、生态养生等绿色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山区养育了一半多的浙江儿女，维系着全省的生态安全，承担着科学发展的历史重任。

然而，生态环境禀赋之于山区发展，犹如“双刃剑”。在工业经济主导的时代，山区较多的生态空间缩减了可开发空间，较大的生态脆弱性加大了要素资源开发压力，较高生态环保要求提高了开发建设成本。这种状况下，山区普遍开发强度较低，绝大多数山区县建设用地面积占县域面积比重低于3%，其中最低的丽水市景宁县、庆元县均仅为0.4%，与全省最高的温州市区13.9%相距甚远。山区经济长期滞后，且一度与全省发达地区的差距出现拉大的趋势。山区26个欠发达地区^①与全省差距最大的2005年和2006年，其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分别仅相当于全省平均的43.5%、29.5%和49.9%。

生态优势突出、经济滞后明显——山区发展条件的两重性，决定了山区必将走一条与沿海地区截然不同的道路。近年来，山区正视经济薄弱这个最大实际，张扬生态环境这个最大优势，积极探索创新绿色发展道路。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调研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10余年来，浙江深入挖掘和创造性发挥大绿、大山、大水等自然生态资源优势，深度演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浙江样本，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① 200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衢州、丽水两市及所辖的县（市），以及泰顺、文成、永嘉、苍南、磐安、武义、三门、仙居、天台和淳安等26个县（市、区），列为欠发达地区，制定相关扶持举措。

山区坚守生态环境，坚持把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作为底色和底线，空气、土地、矿产、森林、水与水力、生物、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及修复全面加强。近 5 年来，山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 值）和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得分逐年上升，2016 年丽水市上述两项指标保持全省第 1 位，衢州市亦保持全省前 3 位。

山区创新生态旅游，积极实施“全域化”和“品牌化”策略，生态旅游主导的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在“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近 10 年来游客数量、旅游收入、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均超过 2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于全省平均，提高至高于全省平均 1000 余元。在浙江最边远山区县庆元，自 2012 年确立“寻梦菇乡、养生庆元”发展思路以来，大力推进生态休闲养生经济发展，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30% 以上，2016 年实现 39.7% 的高速增长，生态经济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山区生态经济贡献不断加大，实现追赶发展。2005—2016 年，山区 26 个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全省差距显著缩小。至 2016 年，山区上述 3 项指标已达到全省平均的 60.4%、44.6% 和 93.1%。基于山区加快发展的实际，2015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淳安等 26 县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摘掉 26 县“欠发达县”帽子，将欠发达地区更名为“加快发展地区”。这一文件明确对 26 县不再考核 GDP 及相关指标，加强生态经济、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居民增收等指标考核，从制度上保障山区摆脱“唯 GDP”的发展导向，支持山区进一步把工作重心放到绿色发展上来。

图表 0-2 山区与全省主要指标差距缩小

年份	全省平均（元/人）			26 个加快发展地区（元/人）			26 个加快发展地区 相当全省平均（%）		
	人均 GDP①	人均地方 财政收入 ②	人均地方 财政支出 ③	人均 GDP④	人均地方 财政收入 ⑤	人均地方 财政支出 ⑥	④/①	⑤/②	⑥/③
2000	13309	762	958	6269	257	489	47.1	33.7	51.0
2001	14655	925	1322	6918	379	683	47.2	41.0	51.7
2002	16838	1250	1653	8010	412	868	47.6	33.0	52.5
2003	20444	1552	1970	9207	504	1012	45.0	32.4	51.4
2004	24352	1968	2322	10704	566	1174	44.0	28.8	50.6

续表

年份	全省平均（元/人）			26个加快发展地区（元/人）			26个加快发展地区 相当全省平均（%）		
	人均 GDP①	人均地方 财政收入 ②	人均地方 财政支出 ③	人均 GDP④	人均地方 财政收入 ⑤	人均地方 财政支出 ⑥	④/①	⑤/②	⑥/③
2005	27703	2318	2750	12091	687	1372	43.6	29.6	49.9
2006	31874	2804	3179	13865	829	1666	43.5	29.5	52.4
2007	37411	3540	3878	16496	1056	2068	44.1	29.8	53.3
2008	42214	4124	4711	19270	1221	2497	45.6	29.6	53.0
2009	43857	4061	5030	20349	1309	3205	46.4	32.2	63.7
2010	51758	4789	5890	24284	1585	3845	46.9	33.1	65.3
2011	59331	5768	7034	28752	1967	4562	48.5	34.1	64.9
2012	63508	6283	7599	31145	2165	4937	49.0	34.5	65.0
2013	68805	6906	8604	34071	2471	5799	49.5	35.8	67.4
2014	73002	7484	9367	36426	2695	6507	49.9	36.0	69.5
2015	77644	8684	11999	38513	3165	7961	49.6	36.4	66.4
2016	84916	9485	12476	51310	4232	11610	60.4	44.6	93.1
2016年比2005年/2006年提高（个百分点）							16.9	15.1	43.2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7年浙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四 人口：迎来数量与素质两大红利的渐变

以用工荒和劳动工资上涨为标志，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已成大势所趋。自2004年开始，用工荒、缺工等字眼便屡见报端，但是当时的用工荒主要是技工荒。直到2010年全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首次达到1，表明我国劳动力已出现供小于求的局面。在浙江，劳动力供给亦开始出现短缺。2010—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3911.6万人减少至3816.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72.4%降至68.9%，下降了3.5个百分点。预计至“十三五”期末这一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65.0%。这种状况对于浙江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的增长模式形成较大冲击，劳动力成本从过去较低水平开始回升。2010年以来浙江工人工资增速一反过去长期大幅落后于GDP的态势，呈加速增长。2010—2015年制造业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扣除物价后年均增长13.0%，高于同期人均GDP

增速 3.8 个百分点。面对工资较快上涨,工业企业迅即做出反应,通过减少用工数量控制工资总额增长。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数量在 2010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857.6 万人之后持续减少,至 2016 年减至 697.3 万人,减少了近 1/5。

本专科大学生为主体的就业群体加速扩大,素质型人口增长形成浙江第二次红利。浙江省本专科招生人数成倍增长,1978—1997 年的 20 年间仅年均 1.9 万人,1998—2007 年间年均提高至 17.5 万人,2008—2015 年进一步大幅提高至年均 26 万多人,加上其他省份进入浙江的大学生,浙江每年约有 40 万本专科生需要就业。这种状况下,各种机构通过增加高素质劳动力聘用,促进工艺技术装备使用,降低先进工艺技术使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影响。以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1 年以来机器设备规模档次不断升级,2011—2016 年企业人均机器设备年均增长 7.0%,考虑到同期固定资产折旧率提高了 7.3 个百分点,人均机器设备增速更高。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技术设备投入的提高,推动劳动生产率以 7.4% 的速度增长,相对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 7.1% 的增速而言是一个较高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就业群体进入生产一线,推动生产第一线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技术的再创新,浙江经济开始逐步摆脱过去高度依赖低端适用技术的增长模式。

在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素质型人口红利浮现的背景下,浙江应顺势而为,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人口转型。一是深刻认识现行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限制。围绕进一步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探索推行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激励政策。二是深刻认识人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围绕进一步优化提升人才成长环境,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覆盖全部人口的人才培育体系,进一步破除约束人才成长的制度障碍,充分激发人的创新能力。三是深刻认识浙江产业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千方百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新产业、高端服务业发展,以更高层次人力资本需求替代低层次劳动力需求。同时,这也引出了第五个方面,浙江的产业转型。

五 产业:践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是改革开放头 30 年困扰浙江经济的一